

## 五、战争与经济

经济是军事的基础，足以决定战争的继续，亦足以决定战争的胜败。其表现于古代战争上，已相当显著，「孙子兵法」一书是两千多年前的著作，其中说：「凡用兵之法：驰车千驷，革车千乘，带甲十万，千里馈粮，内外之费，宾客之用，胶漆之材，车甲之奉，日费千金，然后十万之师举矣。」惟现代战时经济的动员则非古代局部的动员可比，它是要澈底地由平时经济体制改变为战时经济体制，即整个的动员，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。

在国父遗教中，关于战争与经济及其有关言论很多，我在这里姑分为——财政、工业、粮食这三方面来研究：

### 一、财政方面

近代战争是金钱的大需要者，也是金钱的大量消耗者，简直成为天文学上的数字。像普法战争，双方的战费共计美金三三〇、〇〇〇、〇〇〇元，日俄战费共计二、一〇〇、〇〇〇、〇〇〇元，第一次世界大战共计二〇八、三〇八、〇〇〇、〇〇〇元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共计六八〇、〇〇〇、〇〇〇、〇〇〇元。所以近代战时的支出，尤其是长期战争的支出，不是任何财政学者于事前所预想得到的，这个原因是由于：一、动员人数的庞大，二、军需品消耗的增加，三、物价的上涨，及战时各种新事业的举办。

德国经济学家说：「战争的决胜，是决定于剑，也是决定于金，尤其是金在战争的进行中及终结时更表演着不可轻视的作用。」日人中泽三夫在其所著「战争」一书曾慨叹道：「日俄战争……日本的现金准备，仅有一亿余元，所以在讲和会议上，不能强硬主张我意志的原因，不外为财政困难所压迫，真的金钱为战争所不可缺之一。」所以一国的对外战争为赢得胜利，在财政上应作充分的准备，及战时的澈底动员。

国父在倒清的革命战争中，关于军费的需要，其解决的办法，是采取募捐、借债及发行军用票等项，就中以获得华侨的捐助为多，不过当时所需要的数字并不大。国父于推翻满清之后，不久，适逢帝俄虎视眈眈，欲并吞我外蒙古，这时国父极力主张对俄抗战，并主张「钱币革

命」，即以「纸币代金银」，以解决对俄抗战的财政困难问题，他说：「第一、行钱币革命以解决财政之困难。今日我之不能言战者，无过于财政困难。自南北统一后，则谋借外债，以救我金融之恐慌。然至今六国之借款无成，若一有战事，则更复无望。然则就财政上言曲之，无论有战无战，财政问题之当解决，必不容缓也。文于谋革命时，即已注意于此，定为革命首要之图。乃至武昌起义，各省不约而同，寝而北军赞和，清帝退位，推行之顺适，回出意外，故所定方略，百未施一。民国大定后，财政虽困，以为皆可以习惯之常理常法以解决之，便不欲以非常之事而惊国人也。不图借债无成，而俄祸又起，存亡所关，不能不出非常之策以应之也。钱币之革命者何？现在金融恐慌，常人皆以为我国今日必较昔日穷乏，其实不然，我之财力如故，出产有加，其所以成此穷困之象者，则钱币之不足也，钱币维何？不过交换之中准，而货财之代表耳。此代表之物，在工业未发达之国，多以金钱为之，其在工商已发达之国，财货溢于金钱千百万倍，则多以纸票代之矣。然则纸票者，将必尽金银之用，而为未来之钱币，如金银之夺往昔之布帛刀贝之用。……由此观之，纸币之行用有方，流弊不生即如彼，而利益之大又如此，况值非常之变，非先解决财政问题，必不能言战。乃有热血之士，徒责政府之无能，而不为设身代想，殊不共谅当局人为难之什也。当此强邻迫处，蚕行瓜分之秋，非徒大言壮语所能抵御，非有实力之对待不可，是宜政府与人民同心同德，协力进行钱币革命，以救今日之。」（「钱币革命通电」）

本来在欧美各国早已实行币制革命，而国父这个伟大的主张，直至民国二十四年方得实现，即所谓「法币政策」的成功，（禁止纸币兑现，白银收归国有，并规定以中中交农四行的钞票为法币）过去抗战之所以能够持久，端赖财政支持的力量，实行法币政策的结果，亦即实建国父素所主张钱币革命的结果。虽说当时通货膨胀达于极点，却能支持至于胜利，并未拖垮战争，这不能不算是不幸中之幸。

国父说：「倘财政之困难能解决，则军事敢说必有把握。」（民十二「覆叶某囑解决东征军费函」）可见他对战时财政的重视，及财政影响军事之大。又说：「此后外部，完全不成问题，所有的还是内部问题，这个内部问题，简单的说，就是财政问题。」（「打破旧思想要用三民主义」讲词）又说：「政府为担负这样多的军饷，财政是很困难的。……这个银行之所以能够开办，就是因为借了外国资本一千万，……

发行纸币，要维持这种纸币的信用，便要商界工界农界和政界军界同力合作，来培植这种鸡母和穀种的发达，使可以生出许多鸡蛋和新谷，这种鸡蛋和新谷，又可以再做种子，再生出鸡母来生蛋，再长成新谷来做米，这种丛生不绝的生长，是毫无止境的，是毫无限量的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军界和政界便不怕穷，工商界和一切人民，便不怕没有资本，这个银行更是利益无穷。」（「银行最高的信用是现兑」讲词）这是国父迫不得已借外债来开设银行发行纸币以供军用的，凡此均可见国父解决战时财政的苦心。

此外国父在财政上主张征收直接税说：「资本家的入息极多，国家直接征税，所谓多取之不为虐。从前旧税法，只是钱粮和关税两种，行那种税法，就是国家的财源，完全取于一般平民，资本家对于国家，只享权利，毫不尽义务，那是很不公平的。德国英国老早发现这种不公平的事实，所以他们老早便行直接征税的方法。德国政府的岁入，由所得税和遗产税而来的，占全国收入约自百分之六十之至百分之八十。英国政府关于这种收入，在上次欧战开始的时候，也到百分之五十八（按英国在欧战期间，所得税收入增加七倍，遗产税增加二倍——浴日注）。美国实行这种税法，较为落后，在十年之前，才有这种法律，自有了这种法律以后，国家的收入，便年年大形增加，在一千九百一十八年，专就所得税一项的收入而论，便约有美金四十万万元。」（「民生主义」第一讲）国父这个主张，直至七七事变我政府于同月廿一日颁直接税暂行条例，八月廿二日公布施行细则，方树立了「直接税体系」，使租税重心，由间接税移于直接税，因而增加收入，支持长期的抗战。

依于上述足见国父对战费的筹措，是采用发行、增税、借债及募捐等办法，正与现代各国战时财政政策相符。今日我们反共抗俄，在财政上虽感不足，地方券额外发行将达五亿元，但币值相当稳定，税收亦有增加，且得源源而来的美援——经济援助，军用援助，其基础颇属巩固。不过还要澈底动员，促进生产，节约消费，鼓励国民捐献，海外华侨输将，及博取更多的美援，方能配合反攻大陆的要求。于此应附带一提的：因为战时社会的动荡，物价的高涨，生活的困难，每易使财务人员营私舞弊，侵吞中饱的，故必须澈底厉行国父向所主张「实行惩戒官吏失职」（「国民党政见宣言」）的政策，以肃清贪污，使财界明朗化，做到涓滴归公，这样自可提高政府的威信，而博得人民的信仰与拥戴。鲁登道夫将军说：「人民既为国家而牺牲其金钱，则战时公债一

丝一毫，应用之于公，而不应用之于私，应用之于国事，不应以之肥私囊。若有侵吞公款之行为，无异于政府自为盗贼，掠夺民财，其应防止之也，自不待论。世界大战中德人之应募公债者，既为牺牲一己，原期于维持民族生存，而其结果如何乎？由世界大战之经验观之，惟肃清政治上之弊窦，然后能保国民之一致团结，此在财政上尤为重要。」

## 二、工业方面

工业在现代战争上，其重要性并不亚于财政。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，德军所以能屡建奇勋。主要的是得力于本国工业的发达，德国的领土虽然狭小，但在很小的领土之内，能建立庞大的军队，与敌国作战达数年之久，就是赖于工业上能移供给德军所需要的步枪、大炮、机关枪、飞机和技术。又如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，能移成为「民主国家的兵工厂」，也是由于平时工业的发达，一到战时，便能大规模动员，生产大炮、飞机、坦克等精锐武器来源源接济各盟国作为反攻轴心国家之用，尤以原子弹的发明为美国科学与工业上的一大成功。

中国工业的落后，由来已然。所以，国父于上李鸿章书中便提出发展工业的主张说：「机器巧则百艺兴，制作盛，上而军国要需，下而民生日用，皆能日就精良，而省财力。」民国以来，更倡导不遗余力，因有「实业计划」一书的发表，同时目击国内质本、工具及人才的缺乏，认为欲发展中国工业应求助于外国。他说：「欧美二洲之工业发达，早于中国百年，今欲于甚短时期内追及之，须用其资本，用其机器」若外国资本不可得，至少亦须用其专家发明家，以为吾国制造机器。无论如何，必须用机器以辅助中国巨大之人工，以发达中国无限之富源也。」（「实业计划」第五计划）又说：「吾国既有天然之富源，无量之工人，极大之市场，倘能借此机会，而利用欧美战后之机器与人才，则数年之后，吾国实业之发达，亦能并驾欧美矣。」（「中国实业当如何发展」一文）然此非我的创举，外国亦复如是。国父说：「俄国之制造厂、兵工厂，皆用英美人为之，日本意大利两国，其关于制造事业，亦多由英人主持。」（「欢迎外资与门户开放」讲词）惟主权要操之于我，方不致受外人的宰制。国父说：「鄙人主张用外人办理工商事业，及订立一定之期限，届期由我收赎，并非利权永远落于他人之手也。」（同）又说：「倘知此为兴国之要图，为救亡之急务，而能万众一心，举国一致，而欢迎列国之雄厚资本，博大规模，宿学人才，精练技术，为我筹

划，为我组织，为我经营，为我训练，则十年之内，我国之大事业必能立于国中，我实业之人才，亦同时并起，十年之后，则外资可以陆续偿还，人才可以陆续成就，则我可以独立经营矣。」（「孙文学说」第七章）可是欲发展工业，必须同时发展矿业，如煤铁等，因为煤铁同为近代工业的两大原料，没有钢铁，则陆海空兵器方无从制造，没有煤炭，则一切军需工厂的机器亦无从发动。至于石油的开采亦至必要，倘若缺乏石油，则在工业上所生产的兵器如飞机、坦克、兵舰等，均无从活动，变成死物。所以国父在「实业计划」上，亦计划大规模发展石油矿业。虽说「实业计划」为平时工业建设的计划，但平时工业，为战时工业的基础，亦即战时工业的准备。平时工业尤以重工业没有发达，一遇战时的动员就要捉襟见肘，无从适应战争的需求。现在欧美各国的战时工业大半寄托于和平工业之中，因为和平工业可以改变为战争工业，例如商船厂可以改制兵舰，汽车厂可以改造飞机发动机，火车厂可以改造大炮，普通机器厂可以改进步枪机关枪，造纸厂可以改造抛射药，颜料厂可以改造炸药，造币厂压片厂可以改造枪炮弹壳等。同样战争工业亦可以改变为和平工业，国父说：「造巨炮之机器厂，可以改制蒸汽辗压，以治中国之道路。制装甲车自动车之厂，可制货车以输送中国各地之生货，凡诸战争机器一一可变成和平器具。」（「实业计划绪言」）可见国父提倡发展中国工业的用意。

国父说：「军器一门，我们从前用是弓箭刀枪，试问现代战争，能用不能用？试问现代战争，不用外国枪炮，能胜不能？」（「同胞要同心协力做建设事业」讲词）又说：「由于于那次义和团失败以后，中国便知到从前的弓箭刀枪，不能够和外国洋枪大炮相抵抗。」（「民权主义」第五讲）又说：「德意志联邦，成立之初，本来是农业国，后来变成工业国，因为工业发达，所以陆海军也随之强盛。」（「民族主义」第四讲）这是说战争与兵器的关系，兵器与工业的关系。今日台湾的工业力量还是很薄弱的。如为配合将来反攻大陆的要求，必须遵照国父的遗训，动员工业，发展工业，并欢迎外商投资。一面大量生产武器，另一面争取更多的「军援」。

### 三、糧食方面

粮食影响于战争的重大，由来已然。唐将张巡孤守睢阳，屡战屡胜，终因「罗掘俱穷」，为敌所破。在此以前，像历史家陈寿所撰诸葛

亮传说：「亮复出散关，围陈仓，曹真拒之，粮尽而还。……九年亮复出祁山，以木牛运，粮尽退军。……据武功五丈原，与司马懿对于渭南，亮每患粮不继，使己志不得申，是以分兵屯田，为久驻之基。」在此以前，孙子主张：「因粮于敌」，及强调：「军无粮食则亡」。又如拿破仑的天才，当作战的时候，遇有粮食问题者，必痛斥以「不要谈粮食」，因犯有这种疏忽，终不免惨败于莫斯科的饥寒交迫之中。以上系就军粮而说，至于民粮亦有同样的重要，德国在第一次欧战中，因粮食的恐慌，弄得人民个个吃不饱，暴动遍于全国，便促成德国崩坏了。有人说：「粮食是战争的生命。」又有人说：「粮食是决定战争支持力的因素，又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因素。」实非虚语。

中国号称地大物博，向以农立国，对于粮食本可自给自足。可是因为地利未尽，及运输不便，而人口却一天一天的增加，故年丰而太平时，尚可自给，一遇岁歉而战乱时，就不免发生恐慌。考我国粮食仰给外国由来已久，如唐书陈懋仁的「泉南笔记」，就有洋米输入的记载。近百年来，因天灾人祸的交煎，尤以帝国主义的侵略，使我粮食愈不能自给，每年仰给于洋米为数甚巨(如民十九年达二千万石左右)。国父早见及此，于上李鸿章书中，就提出「地尽其利」的「农政有官，农务有学，耕耨有器。」为「富强大经，治国大本。」于民主主义里又强调：「民生主义的第一个问题，便是吃饭问题。」又说：「吃饭问题就是顶重要的民生问题，如果吃饭问题不能解决，民生主义便没法解决。」可见他对粮食问题的注意。又在同主义里说明粮食与战争的关系，举第一次欧战中德国为例证说：「未经欧战以前，各国政治家总没有注意到吃饭问题，在这十年之中，我们留心欧战的人，研究到德国为什么失败呢？正当欧战剧烈的时候，德国都是打胜仗，凡是两军交锋，无论是陆军的步兵、炮队和骑兵团，海里的驱逐舰、潜水艇和一切战鬪舰，空中的飞机、飞艇，都是德国战胜，自始至终，德国都没有打过败仗。但是欧战结果，德国终归于大败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德国之所以失败，就是因为吃饭问题。因为德国的海口，都被联军封锁，国内粮食，逐渐缺乏，全国人民和士兵都没有饭吃，甚至于饿死。不能支持到底，所以终归失败，可见吃饭问题，是关系国家之生死存亡的。……德国的粮食，在平时已经是不够，当欧战时候，许多农民都去当兵士，生产减少，粮食更是不够。所以大战四年，归到结果，便是失败。由此可见全国的吃饭问题是很重要的。（第三讲）

可是欲求中国粮食的自给自足，必须从增加生产方面着手，国父在民生主义里指示我们七个增加生产的方法，即机器、肥料、换种、除害、制造、运送、防灾等问题，兹分别摘要说明如下：

1. 机器问题——用机器耕田，生产可加一倍，费用可轻十倍或百倍。用机器抽水来灌溉田地，非常便利。
2. 肥料问题——用化学方法来制造肥料，用电来造人工硝，用水力来造便宜的电，农业生产，自然可以增加。
3. 换种问题——用交换种子方法，使土壤可以交替休息，生产力可以增加。
4. 除害问题——（一）植物的害——用科举方法除去秕草和利用秕草。（二）动物的害——用国家力量，研究除害虫方法。
5. 制造问题——（一）中国制造方法：晒干，腌咸。（二）外国制造方法：将食物煮熟，或烘热，制为罐头。
6. 运输问题——（一）运输不便的损失：中国财富无形中因运输不便而消耗者甚大，过剩的生产成为废物，如极重要的粮食，时常因运输不通，而使吃饭问题不能解决。（二）解决运输粮食的问题：（1）水运：恢复运河制度。原有的修理，未来的开辟。海上运输，更是要用大轮船。（2）铁路：到处联络起来，各处人民便有便宜饭吃。（3）车路：穷乡僻壤，通自动车，以救铁路之穷。（4）挑夫：虽不经济，但自动车不能行的地方也可以补救。
7. 防灾问题——（一）水灾：（1）治标方法——浚河，筑堤、大水不至泛滥。（2）治本方法——多种森林蓄积大量的水。（二）旱灾：（1）治标方法——机器抽水，用于地势高水源少的地方。（2）治本方法——种植森林蓄积大量的水。

其次说到粮食消费的管理：国父于手订「地力自治开始实行法」第二事的「立机关」中，又主张股置「粮食管理局」，实行粮食公卖，其所订办法是：「粮食一类，当有地方公局买卖，对于人民需要之食物，永定最廉之价，使自耕自食之外，余人得按口购粮，不准转卖图利，地方余粮则由分局转运，售卖于外。」于此足证明国父对粮食消费，是主张采取管理政策的，在战时尤为必要。这样，自可杜绝地主奸商的囤积居奇，而粮价得以安定。现代世界各国在战时对于粮食的消费都是采取管理政策，第一次欧战中各参战国如此，二次欧战中各参战国也是如

此。国父关于第一次欧战德民粮食消费管理的效果，曾有如下的说明：「近代国家之行民生政策者，以德国之组织为最进步，而此次欧战一开，则德国海面被英封禁，粮食时虞竭乏，社会忽起恐慌，人民备受种种之痛苦。至两年以后，乃始任巴特基氏为全国粮食总监，巴氏乃用科学之法，以经理粮食，而竭乏之事，始得无虞，恐慌之事渐息，而人民之痛苦亦渐减，由德国乃能再支持二年之久，否则早已绝粮而降服矣。」（「孙文学说」第一章）今日我政府在台湾已实行粮食管理政策，年产粮食一百五十四万吨，已超过日据时代年产一百四十万吨之最高纪录。故粮价相当稳定，倘能再加改善，粮价更可持平，可见国父政策的正确。

第一次欧战时，英人特奈尔氏上书英国首相路易乔治说：「我们根本的错误，就是以为粮食不是战争的军器，而农村不是兵工厂。」真的战时生产粮食的「兵工厂」与制造枪炮的兵工厂有着同等重要。所以我们今日在台湾，由于粮食的充裕，军民吃饭问题的解决，我们不要忘记终岁勤劳的农民，农民在后方流汗的贡献，其功并不下于前方流血的士兵。不过为使农民高兴去耕田，提高他们生产的兴趣，还得实行国父这个伟大的遗教：「中国的粮食生产既然是靠农民，中国的农民又是很辛苦勤劳，所以中国要增加粮食的生产，便要在法律政治上制出种种规定，来保护农民。中国的人口农民是占大多数，至少有八九成。但是他们由很辛苦勤劳得来的粮食，被地主夺去大半，自己得到手的几乎不能够自养，这是很不公平的。我们要增加粮食生产，便要规定法律，对于农民的权利，有一种鼓励，有一种保障，让农民自己可以多得收成。我们要怎么样能够保障农民的权利，要怎么样令农民自己才可以多得收成，那便是关于平均地权的问题。前几天我们国民党在这高师学校，开了一个农民联欢大会，做农民的运动，不过是想解决这个问题的起点。至于将来民生主义真是达到目的，农民问题真是完全解决，是要耕者有其田，那才算是我们对于农民问题的最终结果。」（「民生主义」第三讲）现我政府在台湾已根据国父这个遗教，实行「三七五减租」，以保障农民利益，并使多得收成。至于「耕者有其」，亦正作初步的实施，例如年来公地由放租到放领，又采取限田政策，即将实施「扶植自耕农条例」，其顾及广大农民的利益如此，自可争取他们来支持反共抗俄的战争。

此外，关于对敌经济作战，在遗教中，我发现他提过二个方式：一为经济封锁，一为经济绝交(均见「三民主义」)。现就经济封锁稍加

说明：经济作战最有效的力式，就是海军封锁，即直接封锁敌国的海洋交通，以断其对外贸易关系，但须有强大的海军来执行。第一次欧战开始后，英国即以海军主力控置北海，封锁了斯干的那维亚半岛，使货物不能经过荷兰、丹麦与挪威输入德国，举凡是否战时违禁品，只要是输入德国的，或德国输出的，都被没收，使德国经济起了极度恐慌。同时德国对协约国，尤其是英国，也施以经济封锁的报复，但因德国海军力量不够，不能同英国一样的作水上封锁，只是实行深水封锁，即以潜水艇封锁英国，使英国亦受很大的痛苦。二次欧战，英国对德又以强大的海军做水泄不通般的封锁德国，德国亦用潜水艇袭击英伦，同时双方又采用各种方法来破坏敌方的封锁，例如德国利用西班牙的中立地位转运由美洲输入物资，英国实行武装护航，以防御潜艇的袭击。说到我们反共抗俄，以台湾的地理环境，四面环海，又有海军巡逻及第七舰队协防，当然不怕中共苏俄封锁，而我政府早已对中共苏俄进行经济绝交，尚待恢复经济封锁。此刻三次大战未爆发，美英诸国对中共苏俄已经实行战略物资禁运。他日大战爆发，中共苏俄因先天不足，经济困竭，我们民主国家应予以澈底封锁，促其早日崩坏。